

# 哈罗德·布鲁姆与比较文学\*

西华师范大学 曾洪伟

**摘要:**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实践与比较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受其互文性理论和思维模式以及其百科全书式知识储备与结构的影响,布鲁姆后期的文学批评已涉及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主要方面,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实践对比较文学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与启发价值,今后学界应充分重视和挖掘布氏理论及批评的比较文学价值。

**关键词:** 哈罗德·布鲁姆; 比较文学; 影响研究; 平行研究; 跨学科研究

**作者简介:** 曾洪伟,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艺理论及比较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zhwoo@163.com

虽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从未在其学术论著中提及“比较文学”,但在深层次上,他却与比较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如他后期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已涉及到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含跨学科研究)等。除此之外,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影响的焦虑”、“六个修正比”、“审美自主性”、“经典观”、“事实性理论”等)与实践对比较文学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与启发价值。但至今国内却鲜有人系统揭示布氏与比较文学的密切关系,本文拟比较系统地就布鲁姆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展开研究,尽可能多地挖掘布氏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比较文学价值,以期将目前的布鲁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 1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和宗教批评

众所周知,布鲁姆早期的“误读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互文性理论,而受该理论以及布氏自身“百科全书”式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的影响,在后期,布鲁姆试图在其文学批评中构建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经典)批评模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氏的批评思想逐渐趋于丰富和成熟,其互文理论内涵也逐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方

向发展：其互文既指同一文化、同一国别范围内的互文，也指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甚至跨学科范畴的互文。其互文理论已具有了很强的开放性。在具体的文学经典批评实践中，布鲁姆特别注重从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模式去考察或证实作家与文本的经典性，而这种互文性的经典批评又可细分为三个实践维度：①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影响研究；②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平行比较（含跨学科比较）；③相同语言、相同文化、相同国别范围内的比较。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和分析布鲁姆比较文学性质的文学批评所体现的层面（主要为前面①、②两个实践维度）与特点。

### 1.1 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作为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策略与范式——比较文学视阈中的布鲁姆文学经典批评

布鲁姆比较文学性质的文学（经典）批评既体现在影响研究层面，又表现在平行研究维度。下面拟以布氏的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批评为例。

布鲁姆对塞万提斯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他是在将塞万提斯与其他作家（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对比中来展示其崇高的经典地位的。他认为塞万提斯堪与莎士比亚、但丁等核心经典作家媲美，因为他“具有天才的普遍性”；他与莎士比亚、蒙田都是“智慧型作家”，是小说文体中的蒙田；而在艺术的某个层次和造诣上，则只有塞万提斯可与莎士比亚相抗衡，其经典性是由其代表作《堂吉诃德》彰显出来的。

布鲁姆认为，《堂吉诃德》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而且他认同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评价和赞誉——“这部小说是真正的西班牙圣经”，其主人公堂吉诃德则是“基督”（哈洛·卜伦，2002：253）。同时，《堂吉诃德》的艺术影响是世界性的和跨文化的：这包括对英、法、美等主要西方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影响与塑造，如英国的亨利·菲尔丁、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和劳伦斯·斯特恩等，塞万提斯是他们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艺术源泉。“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塞万提斯，还会有他们的作品。”（哈洛·卜伦，2002：253）而塞氏对法国文学史上的司汤达和福楼拜影响也很大，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形象有着显明的堂吉诃德的影子，她被认为是“女性的堂吉诃德”。其他如美国的麦尔维尔、马克·吐温，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德国的歌德和托马斯·曼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西班牙裔小说家”都是塞氏的“门徒”和“追随者”。

而更深入地讲，《堂吉诃德》的经典性还在于，塞万提斯在核心人物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札之间巧妙地设置和营构了一种对话性的、平等友谊的、可以促进相互间人格建构但又具有张力性的人际关系——这是《堂吉诃德》的重要原创性：这一形

态的人际关系不仅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关系中不存在,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鲜有其例。

这种特别的角色关系模式也影响或者说形成了塞万提斯表现人物性格发展变化——即自我的更新、深化和内化——的(独特)方式,这与莎士比亚表现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札是通过相互倾听、交流与互动而“发展出更新、更丰富的自我”的——在言行的互动交流(如交谈、争吵等)中,双方成功地吸纳对方的人格特质,他们的个性和思想都开始发生趋向对方的、呈互补性的渐变和改善(但同时又不会丧失自我个性而完全等同于对方,即始终保持一种性格间距、性格差异和人格张力,这同时也为小说情节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堂吉诃德的幻想狂开始舒缓,个性变得比较稳重,而山卓(即桑丘·潘札——引者注)也调整他那建立在常识上的机智,开始享受游侠的理想追求”(哈洛·卜伦,2002:256)。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则通过自我倾听的方式发展出更新、更丰富的自我[布氏认为,莎氏剧中的人物缺乏相互对话,他们“只顾自己说话”,“从不认真地听取别人的倾诉”,如“李尔王从不听别人说什么,而安东尼奥和克莉奥佩特拉根本不听对方说话”(哈洛·卜伦,2002:254)]。而基于不同的倾听方式的人物性格自我更新,其孰优孰劣是很明显的,它影响和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发展轨迹以及精神气质,人物的最终命运也泾渭分明: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在创造个性上都是超群的,但是最杰出的莎士比亚人物,如哈姆莱特、李尔、伊阿古、夏洛克、福斯塔夫、克莉奥佩特拉及普洛斯佩罗等人,最终都在内心孤独的氛围中悲壮地凋萎。堂吉诃德和桑丘却是互相解救的。他们的友谊是经典性的,并且部分地改变了往后的经典本质。(哈罗德·布鲁姆,2005:100—101)

即莎士比亚人物在自我倾听、自我封闭中心灵陷入困顿,精神走向沉落和萎靡,生命缺乏激情与昂扬活力;而塞万提斯人物(堂吉诃德和桑丘)却在互相倾听、互相促进中彼此的性格和人格都得到升华,生命在相互激荡之中迸发出旺盛的活力,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随之超越凡俗而跻身经典。

由于布鲁姆是精英文学或者说高雅文学的推崇者,他的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就必然是经典文学或经典作家,但怎样来确定或证明这些作家与作品的经典性呢?除了从文本本身出发来解读或阐释作品的经典性(内部研究)之外,受其互文性思维模式影响,布鲁姆还十分注重从文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发掘经典、建构经典(外部研究),即研究经典文本对其他作家的影响关系,这一影响既可能是

同一文化范围内的,又可能是跨文化的,而影响的范围越宽,越是跨文化的,文化跨度越大,作家与作品的经典性就越强。而根据布鲁姆的研究,经典作家基本上都是具有跨文化影响力的,如塞万提斯(如前所论)、惠特曼、蒙田、莫里哀、狄更斯等等。而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之所以经典性最突出,是因为其艺术影响力具有无限的、其他作家无可比拟的超越性。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及其经典文本对世界人类文化史的影响在众多艺术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既包括突破空间、地域、文化、语言、民族限制的影响普遍性,也包括打破时间、时代间隔的影响无限深远性和无限延伸性。除了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证实作品的经典性,布鲁姆还特别熟谙从平行比较(尤其是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来呈现作家的经典性。在经典批评实践中,布鲁姆常常选取莎士比亚作为比较的标准与参照,因为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公认的、无可争议的经典中心,他代表着经典的最高水准,以他为标尺衡量经典,其结论无疑具有极强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而在具体的经典批评操作实践与比较策略上,布鲁姆首先肯定莎士比亚作品在艺术成就整体上的不可超越性(这是十分重要的前提),而在某一艺术层面或维度上,其他经典作家却有可能与之抗衡或者甚至超过他,如塞万提斯在表现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方式上就超越了莎氏(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作家的特殊经典性所在。这样,布鲁姆就巧妙而恰当地处理好了莎士比亚与其他作家之间的经典性关系,既捍卫和维护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核心地位,同时又证明和揭橥了其他经典作家的经典性。很明显,在这里,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成为了布鲁姆进行文学批评、建构文学经典的有效武器、重要策略与范式,而其文学经典批评的比较文学性质也显露得十分充分。

## 1.2 宗教与文学之间的互文与建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布鲁姆宗教批评

“我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个宗教批评家,一个古代和现代诺斯替主义的虔诚信徒。”(哈罗德·布鲁姆,2000:155)虔诚的宗教信徒和宗教批评家身份,使布鲁姆不仅关注文学,同时也关注宗教,而布氏的学术生涯和成果也主要分为文学批评与宗教批评两大部分。但是,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由于布鲁姆集两种批评身份和知识结构于一身,且由于其强大的“互文性理论”主张对自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布鲁姆逐渐具有了一种强烈的“互文性思维方式”——结果,在其学术研究中,文学(批评)与宗教(批评)常常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形成一种颇为紧密的互文关联纠结关系。例如,从布鲁姆阐释其诗歌理论四部曲之一的《喀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 1975)一书的书名,以及该书书内目录标题——“一、喀巴拉(Kabbalah)”、二、喀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我们可明显看出(喀巴拉)宗教与其文学批评理论之间的互文关系。实际上,布鲁姆的误读诗学除了建基于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尼采的超人意志说和保罗·德·曼的文本误读说之外,还与犹太神秘主义宗教派别喀巴拉有着深厚复杂的理论渊源。在《喀巴拉与批评》中,布氏将喀巴拉称为“原初图景”,并明确指出自己诗学“修正的冲动”就是以这种“原初图景”为仿拟模型的(Bloom, 2005: 1)。而另一方面,在对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的宗教批评中,布氏又从文学的角度,对约瑟夫·史密斯的伟大宗教创造力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与阐释:他从自己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并形成的“精英文学”观、“文学天才”观、“强力诗人”观等文学观点出发,认为宗教的历史与文学史一样,也是由少数天才人物创造和推动的(不仅如此,他还推而广之认为,人类的命运也是由少数精英人物而不是由“经济和社会实力”决定的)——而约瑟夫·史密斯无疑就是创造摩门教历史的这类天才人物;另外,布鲁姆还从其误读理论出发,指出约瑟夫·史密斯进行宗教创造的根本方式和途径,就是对《圣经》实施“创造性的”强力误读。他认为,“史密斯的见解只能是来自对《圣经》娴熟灵活的阅读”(Bloom, 1992: 81),也就是说,约瑟夫·史密斯对《圣经》进行误读才创立了离经叛道、具有异端性质的摩门教教义,而这也是他作为宗教天才的秘密之所在:他像诗人读者一样具有超强的文本误读能力。因此,在布鲁姆的批评中,宗教与文学往往是互补互动、紧密联系、深度互文的,是互渗互融的二元一体物。下面,笔者拟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考察布鲁姆批评中宗教与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

在其《美国(本土)宗教》(*The American Religion*, 1992)一书中,布鲁姆从比较文学跨学科——跨宗教与文学——研究的角度,通过将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特征相对比,对宗教批评的本质做了集中、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彰显出其宗教观与文学观之间频繁、深层的互文、互动关系。

例如,布鲁姆认为,宗教批评是一种“描述、分析与判断的模式”,它可以使我们更加趋近宗教想象的进行方式与作用机理。文学批评在本质上信赖或者说考察、探究的是戏剧、诗歌和叙事文学中不可缩减的审美维度或因素;与此类似,宗教批评必须探求宗教事物与现象中不可减缩的精神或心灵维度或因素。文学的审美价值超越社会和政治功利与关切(这种功利性的关切日益由低劣的艺术而不是由卓越的艺术来表达),而同样地,宗教的精神价值也超越了社会和 political 的权利诉求(这种诉求更多的是得益于非想象性的而不是富于想象力的信仰)。

那么,宗教批评或者说宗教研究的适当方法与范畴究竟是什么呢?布鲁姆从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的比较中获得了灵感和答案。首先,他认为,所谓的人文科学或历史循环论或政治学、哲学等对于诗歌的诗性研究用处不大——由此他获得关于



宗教批评的方法论启示：只有宗教才能研究宗教；其次，宗教批评与诗歌批评之间还具有研究对象的相似性：诗歌批评是对从诗歌通向诗歌的隐藏之路的研究，而宗教批评则是对将彼此对立的宗教信仰（如摩门教和南方浸礼教）联结在一起的曲折路径的揭示和探寻，也就是说，两者都是对于对象间关系的研究，并且都将批评视野局限在自身范畴之内——诗歌批评仅限于研究诗歌（的诗性），宗教批评仅限于研究宗教（的宗教性）。

布鲁姆还认为，“至少在某一方面”，宗教批评必须模仿文学批评并以它为批评模式，以“不可减缩的精神元素”替代“不可缩减的审美效果”。因为宗教与诗歌/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在反对死亡的态度和立场上，宗教教义、宗教体验和诗歌之间具有共同点——即宗教的宗教性是旨在对抗死亡的，而诗歌的诗性是为了寻求战胜时间的。而批评，对于文学而言就是在诗歌中寻求诗性，对于宗教而言就是在宗教中寻求宗教性。

布鲁姆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互文性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布鲁姆追随和模仿沃尔特·佩特写作“鉴赏式”文学批评，而同时，作为一个宗教批评家，他又意图从事同样类型的宗教批评：即通过向宗教批评的奠基人物爱默生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学习，写作“鉴赏式”宗教批评，鉴赏美国宗教体验的各种形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布鲁姆文学批评（观）对于宗教批评（观）的同质化影响和建构——即两者之间主要是一种肯定性的互文关系。不过，尽管两种批评在总体上是异质同构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变异和不同，即也包含着否定性的互文关系。例如，它们在具体研究对象和效果上就存在着差异。文学批评研究的是文本，或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对文学批评是有效的；但是文本研究模式或方法对于宗教批评却并不有用或有效，因为文本并不能引导或帮助批评者发现批评对象的本质：“虽然我在本书中研究了从《圣经》到以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的《最高智慧》（*Supreme Wisdom*）这些文本，但是我并不认为文本能够使我们探察到美国宗教的本质。”（Bloom, 1992: 28）不仅如此，研究宗教文本间的关系，或文本与信仰者之间的关系也不会使研究者对宗教有深入的了解。因此，这就与文学批评以文本研究与批评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效果迥然不同。

在此仅略举几例。其实，在布鲁姆的批评著作中，宗教与文学之间的这种互文、互动、互视、互鉴关系可谓普泛存在。在其早期的《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喀巴拉与批评》，中期的《J之书》（*The Book of J*, 1990）、《美国（本土）宗教》，后期的《西方正典》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宗教与文学之间的这种相互纠结与渗

合——包括话语、意象、思想资源、批评模式建构、批评视角开启等层面的相互影响;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可简单概括为宗教对文学在批评话语和思想资源上的建构,文学对宗教在批评视角和批评模式上的重构。而在本部分,我们则可以发现布鲁姆宗教批评的互文性特征包括方法论上的互文(如他从文学批评方法中获得启示:只有宗教才能研究宗教),具体批评观点上的互文(如他认为,诗歌批评和宗教批评都是对于对象间关系的研究,并且它们都将批评视野局限在自身范畴之内)等等。而他在宗教批评中所彰显出来的主动自觉的互文性意识,很明显是受其互文性的文学批评观和方法论影响的(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追踪与探究,我们又可以发现,他在文学上的互文性理论又与宗教——如喀巴拉——密切相关)。

实际上,在后期,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学科方法与范式已成为布鲁姆文学/宗教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这使他在文学研究、宗教研究实践中有了许多崭新的发现,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标志性的、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如《西方正典》、《美国(本土)宗教》、《J之书》等等。这对我国当前的文学/宗教研究而言,不无启发和反思意义。

## 2 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启示与价值

启示一:哈罗德·布鲁姆广为人知的误读理论通过译介渠道很早即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学界所接纳和应用,它对于中国文论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显现:例如,作为一种本身是关于文学审美创新理论,误读理论被学界“误读”和借用而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理基础,并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的突破,而它在异质文学、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意义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与认同,目前,文学、文化误读(现象)研究已正式成为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笔者认为,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启发应不仅止于此。例如,他对于前人或他者(文本)的六种误读方法——即“克里纳门”,“苔瑟拉”,“克诺西斯”,“魔鬼化”,“阿斯克西斯”,“阿波弗里达斯”等——是否也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文化误读和创新的具体方法?这正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法论所欠缺和一直追寻的。由于比较文学与布氏“误读理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即两者都强调互文性、文本间性,都强调一个文本(或一种文化、文学)对另一个文本(或另一种文化、文学)的主体性、创新性、变异性(以实现自身文学、文化的创新与建构),因此,作为实现文学误读、创新、超越的六个修正比(六种方式、手段、途径),无疑也可为比较文学所借用和移植,将其作为文学、文化交流中的具体创新方法与手段。当然,这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操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但它至少

应该是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的。

启示二：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可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提供更为扎实的理论依据，进一步丰富其理论资源库，使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和建立获得更为牢固的理论基础；同时，它还可以为比较文学变异学进一步注入理论和思维的新鲜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误读理论和变异学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强调“异”，而不是“同”（当然还有互文性和文学性、审美性）。变异学强调研究两种文学、文化、两个对象之间的“异”，但它比较强调客观存在的差异，而对文学、文化接受主体的主动（求新）性、积极性、创造性和文化心理、心态有所忽视，而布氏的误读诗学尤其强调接受主体的主动求异性、创新性、叛逆性、颠覆性，认为要实现文学（审美）创新、变异，就必须做“强者诗人”，一定要有焦虑、竞争的心理和姿态，因此，将布氏误读理论引入变异学，无疑会弥补其缺陷，增强其理论活力和应用效力，使文学、文化接受主体更为清醒自觉、更有意识地注重文学、文化的创新性以及变异性——而这对于当前中国文化交流现实语境中，接受主体面对外来文化已形成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自卑弱者情结，一味认同和依赖西方强势文化并进行自我文化殖民，文化主体性缺失，创新力丧失，文化警惕、竞争、创新、超越之心消失的局面和形势而言，无疑是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启示三：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较好地避免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与弊病，是比较文学批评实践的绝佳范例。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由于自身研究模式和历史的局限，“排除了文学研究的美学特质，而单纯强调文学外部的实证性研究”，结果，“文学性”、“审美性”被放逐，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被简化为“国际文学关系史”（基亚语）研究。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学现象之间的传递、影响、接受和借鉴都伴随着审美因素，带有心理因素，而这是实证关系研究所无法求证的”（曹顺庆，2005：29）。但是，由于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位执著的唯美主义者，他极力提倡审美批评，同时他又是互文性批评（包含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性质的批评）的大力提倡者，因此，在其批评实践中，布鲁姆将影响研究与美学批评结合了起来，较好地避免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弊端。可以说，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促成了其文学批评的成功，而其建立在充分审美体验和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审美批评又使其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得到了具体落实。另外，虽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比较注重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研究，但是由于视野的局限，他们往往注重“关联性”（雷马克语）、“亲和性”（韦斯坦因语）的考量，因此，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求同性思维。但是，“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



变异。”(曹顺庆,2005:29)因此,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也存在着一一定的缺陷。而布鲁姆由于在其误读理论中特别强调“误读性”、“变异性”、“创新性”,并形成了一种求异性思维,因此,在其具有平行研究性质的文学批评中,他尤其强调揭示和挖掘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同性(因为在他看来,差异性即意味着文本的独特性、经典性和价值性)。在《西方正典》中,这类平行研究的范例可谓比比皆是。因此,布鲁姆的平行研究较好地克服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弊病。由于布鲁姆是一位文学批评的实用主义者,他的批评实践较好地实现了他的批评理论主张,因此,布氏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著作(如《西方正典》、《如何阅读以及为什么阅读?》等)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界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反思意义——而这也是布鲁姆的著作得以进入文学教育与研究体制的重要原因:“布鲁姆的著作,尤其是《西方正典》一书,迄今仍是美国主要大学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布鲁姆,2005:“译者前言1”)

## 注释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耶鲁学派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SC10C019)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Bloom, H. 1992. *The American Relig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2005. *Kabbalah and Criticism*. New York: Continuum Press.  
 哈洛·卜伦,2002,《尽得其妙:如何读西方正典》(余君伟等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罗德·布鲁姆,2000,《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曹顺庆,2005,《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